

試論《孫子兵法》謀攻篇之道勝思想— 以諸葛亮 隆中對 為對象

劉信利(大復)

天帝教天人研究學院中國道學研究所研究生

摘要

本文試著從〈隆中對〉的時代背景與地緣關係找出當時諸葛亮的戰略思想，並探討其如何從當代局勢中分析，提出劉備集團復興漢室、大一統的戰略計畫。進而從中抽象出孫子兵法謀攻篇的道勝觀念，以其思想為主體，隆中對的戰略部署為應用，探討其思想淵源的脈絡，將其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其開展的部分做一分析以及綜合比較，試著歸納出結論。

關鍵詞：孫子兵法、謀攻、隆中對、道勝

試論《孫子兵法》謀攻篇之道勝思想— 以諸葛亮〈隆中對〉為對象

劉信利(大復)

壹、前言

東漢建安六年(西元 201 年)，曾經依附袁紹的劉備，受到曹操威脅，於此際投靠劉表，惟劉表雖以禮相待，卻暗加提防，讓劉備屯駐新野。這位胸懷大志的漢室宗親，四處奔波，半生坎坷，不甘寄人籬下，因而迫切希望有謀士協助，建功立業。建安十二年(西元 207 年)，由於司馬徽、徐庶的推薦，劉備親往襄陽西郊隆中三顧草廬，向諸葛亮求教，諸葛亮即針對當時的局勢，剖析情況，提出一套復興漢室的策略，此次對話便是在我國歷史上享譽千載的〈隆中對〉。

《孫子兵法》總共有十三篇，分別為〈始計〉、〈作戰〉、〈謀攻〉、〈軍形〉、〈兵勢〉、〈虛實〉、〈軍爭〉、〈九變〉、〈行軍〉、〈地形〉、〈九地〉、〈火功〉、〈用間〉，明朝茅元儀評論孫子：「前孫子者，孫子不遺；後孫子者，孫子不能遺。」¹孫子兵法必有其思想淵源，本文試著從〈隆中對〉的時代背景與地緣關係找出當時諸葛亮的戰略思想，並探討其如何從當代局勢中分析，提出劉備集團復興漢室、大一統的戰略計畫。進而從中抽象出孫子兵法謀攻篇的道勝觀念，以其思想為主體，隆中對的戰略部署為應用，探討其思想淵源的脈絡，將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其開展的部分做分析並綜合比較，試著歸納出結論。

貳、〈隆中對〉之時代背景

東漢末年，由於東漢王朝的殘酷壓榨和自然災害的猛烈襲擊，廣大的農民家破人亡，顛沛流離，無以為生，被迫與地方宗教力量結合。東漢靈帝時期，漢中平元年在太平道教主張角及其兄弟的領導下，爆發了著名的黃巾起義²。起義軍用黃巾裹頭，呼喊出

¹明·茅元儀輯，《武備志》。

²即黃巾之亂，張角、張梁、張寶兄弟三人於冀州魏郡，用法術、咒符水到處為人醫病。張角又派出八使到外傳教，號太平道。因此，追隨的信徒愈來愈多，甚至高達數十萬人，遍及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揚、兗、豫等八州，幾乎佔了當時全國的四分之三。

「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，歲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」³的口號，義軍到處，所在燔燒官府，劫略聚邑，州郡失據，長吏多逃亡。旬月之間，天下響應，京師震動⁴。黃巾起義的浪潮迅速席捲了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，沉重地打擊了東漢豪強地主的統治。面臨滅頂之災的東漢王朝爲了維護風雨飄搖的政治勢力，急忙調兵遣將，向農民起義軍極力反擊，各地的豪強勢力也趁此機會招兵買馬，加入鎮壓農民起義軍的行列。

經過黃巾起義，東漢王朝已經是日落西山，名存實亡了。而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，「豪傑並起，跨州聯郡者不可勝數。」（〈隆中對〉）各地鎮壓黃巾軍的群雄勢力紛紛擁兵自重，割據一方。經過十多年的火拼廝殺，公孫瓚佔據幽州；公孫度佔據遼東；袁紹佔據冀州、青州、並州；袁術佔據揚州；曹操佔據充、豫二州；劉表佔據荊州；孫策、孫權佔據江東；韓遂、馬騰佔據涼州；劉焉、劉璋父子佔據益州，唯獨劉備沒有固定的地盤，率領部隊輾轉四方，先後依附于公孫瓚、曹操、袁紹、劉表等。

建安元年(西元 196 年)，曹操迎漢獻帝到許昌(河南今縣)，在政治上取得了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的有利地位。並先後率軍消滅了呂布、袁術、袁紹等割據勢力，佔領了冀、幽、青、並等州，平定了北方，大有一舉平寧南方，一統華夏的趨勢。經過不斷攻伐兼併，最後三分天下，僅剩下三個較大的國家，即魏、蜀、吳。

參、 隆中對 之地緣分析

先從 隆中對 原文來看：

凡用兵之道，以計為首。未戰之時，先料將之賢愚，敵之強弱，兵之眾寡，地之險易，糧之虛實。計料已審，然後出兵，無有不勝。法曰：「料敵制勝，計險阨遠近，上將之道也」。漢末，劉先主在新野⁵，三往求計於諸葛亮。亮曰：「自董卓以來，豪傑並起，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。曹操比於袁紹，則名微而將寡，然操遂能克紹，以弱為強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眾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⁶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為之用，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⁷北據

³ 蒼天指東漢王朝，黃天指黃巾軍，張角自稱天公將軍，張寶為地公將軍，張梁稱人公將軍。甲子，西元一八四年。(漢中平元年)

⁴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·漢紀五十。

⁵ 新野：諸本皆作「襄陽」，位於河南省西南部，與湖北省襄樊市接壤。

⁶ 江東：長江在蕪湖、南京(三國時稱建業，為吳國的國都)間作西南南、東北北流向，隋唐以前，是南北往來的主要渡口所在，習慣上稱自此以下的長江南岸地區為江東。即今蘇南、浙江北部及皖南部分地區以及今江西贛東北(東部)稱作江東。

⁷ 荊州：漢武帝時所置的十三刺史部之一。轄境約當今湖北、湖南兩省及河南、貴州、廣東、廣西一部分。東漢因之，治所在漢壽(今湖南常德東北)。

漢、沔⁸，利盡南海⁹，東連吳、會¹⁰，西通巴、蜀¹¹、此用武之國，而其主不能守。此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¹²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。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好孫權，內修政治；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、洛¹³，將軍身帥益州之眾出於秦川¹⁴，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¹⁵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」先主曰：「善。」後果如其計。（《三國志 蜀志 諸葛亮傳》）

全文第一句「凡用兵之道，以計為首」，正與〈孫子 始計〉相呼映。文謂：「經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計，而索其情，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將，五曰法。」後面則說：「先料將之賢愚，敵之強弱，兵之眾寡，地之險易，糧之虛實。」在為將「五德」一智、信、仁、勇、嚴中，智視為第一要件。所以，要先瞭解將之智慧，至於強弱、眾寡、險易、虛實即為索其情，這也就是孫子在〈地形〉所說：「料敵制勝，計險阨遠近，上將之道也」。

首先，諸葛亮提出曹操戰勝袁紹的原因。他認為，曹操與群雄相比名位低而兵員少，但卻能由弱轉強，並不是依靠天時，而是人的謀略所成就，進而判斷曹操已經擁有百萬的大軍，能夠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故不可與之正面交鋒。這也就是〈孫子 謀攻〉所講的：「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，識眾寡之用者勝。」至於孫權站在江東，地勢險要，屬南北交通要地，此即〈孫子 地形〉所言：「我可以往，彼可以來，曰通；通形者，先居高陽，利糧道以戰，則利。」〈孫子 九地〉也說「交地則無絕」，佔有此種地利的群雄，具備百姓、賢能樂於歸附的條件，又此地尚利於結為盟援，而不為他人所圖謀。

荊州北有漢水、沔水作屏障，南至於海，有豐富資源可供利用，東連吳郡、會稽郡，西通巴郡、蜀郡。因此，荊州具有易守難攻的戰略地位，即如〈孫子 九地〉所謂「我

⁸漢、沔：即今之漢水，古代通稱漢水或沔水。據《水經注》載稱：其北源出自今陝西留壩西名為沔水，西源出自今寧強北者稱漢。

⁹南海：泛指南方沿海一帶，即今廣東、廣西一帶。

¹⁰吳、會：東漢時分會稽郡為吳郡、會稽二郡，合稱「吳會」，其地轄今江蘇長江以南、大茅山以東及浙江一部份，今蘇州(太湖旁)。

¹¹巴蜀：即巴郡、蜀郡(以成都為中心)，轄境當今四川地區。

¹²益州：漢武帝時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。轄境約當今四川全境以及雲南、甘肅、湖北、貴州部分地區。

¹³宛、洛：即今河南南陽、洛陽地區。

¹⁴秦川：即關中地區。泛指今陝西、甘肅秦嶺以北渭河沖積平原地區，因戰國時地屬秦國而得名。古人習慣上將函谷關以西地區稱為關中。按此地西有大散關，東有函谷關，北有峽關，南有武關，在四關之中，故曰關中。

¹⁵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箝食壺漿以迎王師。

得則利，彼得亦利者，為爭地」的那樣。雖然，荊州形勢如此重要，但其州牧劉表卻無力守住它，故諸葛亮以為，此地大概是上天要用來資助劉備的。

益州地勢險要，沃野千里，物產富饒¹⁶，漢高祖（劉邦）就是靠這裏成就帝業。諸葛亮指出，當今之勢，益州牧劉璋昏庸無能，張魯又在北邊與之作對，儘管此地人口眾多、資源豐富，但因主事者不知愛撫民眾，致使有才能的人都渴望得到英明的君主。劉備既是漢室的後代，又以信義顯揚四海，廣交天下英雄，求賢如饑似渴，倘若佔領荆、益二州，就能控扼險要，西與諸族和睦為鄰，南面撫綏夷越少數民族，對外結交孫權，對內修明政治。按〈孫子 九地〉有云：「諸侯之地三屬，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，為衢地。」益州具有衢地的特徵，既四通八達，又與多個鄰國相接，故應交好四圍，以為屏障，並可掌控鄰近各國的軍事行動。

天下形勢一旦發生變化，就應伺機派遣一員大將率領荊州部隊向南陽、洛陽地區挺進，至於劉備則宜親率益州之兵北出秦川。如此一來，百姓皆願聞風備宴迎接王師！若此，則統一大業可成，漢朝可以復興。

從〈隆中對〉中不難看出，這是諸葛亮針對劉備集團尚無根據地的處境，所提出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方針。概括起來，〈隆中對〉主要體現四個方面：

一、諸葛亮分析當時形勢說：「今操已擁百萬之眾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曆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為之用，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。」（〈隆中對〉）荊州和益州乃用武之地，劉備應利用荊州劉表、益州劉璋不能守成的機會，如能取而代之，建立起可靠的根據地，自可與曹操、孫權三分天下。

二、在奪取荊州和益州的同時，劉備宜利用「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」的聲望，招攬人才，內修政治，增強基本國力（人口、土地）、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，使國家整體力量提升。

三、建議劉備在益州要妥善處理好與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關係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解除後顧之憂，進而從事北伐，這也就是伐謀伐交的方法。

¹⁶四川盆地土地肥沃，氣候溫和、雨量充沛，特別是秦朝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後，成都平原成了中國歷史上農業和手工業都十分發達的地區，亦是朝廷的主要糧食供給基地和賦稅的主要來源，故稱「天府」。漢代的益州包括今四川盆地和漢中盆地。

四、在荊州宜要交好孫權，與其建立抗曹聯盟。待天下有變，再分兵兩路，命一上將率荊州之軍北向宛、洛，劉備則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，若二路都有順利進展，劉備可望復興漢室。

綜觀後續的歷史發展，〈隆中對〉中對當時形勢的分析，基本上符合客觀事實，此乃諸葛亮為劉備集團制定的戰略方針。

肆、從〈謀攻〉解析

原文一：

孫子曰：

夫用兵之法，全國為上，破國次之；全軍為上，破軍次之；全旅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也；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

解析：

前段主要是談「全」與「破」的相對觀念，以全勝為上、破勝次之，接著依序提及「國」、「軍」、「旅」、「卒」、「伍」等。按「軍」、「旅」、「卒」、「伍」，皆為古代軍事編制，人數由多至少。基本上，孫子是以保全總體為基本原則的，故每次作戰得勝，並非是最好的辦法，若能不經作戰，而使敵方自動瓦解，才是最完善的戰略。

從全的觀念來看，大陸軍科院吳如嵩將軍曾說：「孫子講的全就是孔子講的仁，老子講的道。」以孔子而論，仁者愛人，是人的本性；至於老子的道，如《老子》第九章謂：「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。」這是天道對人道所示現的無為不爭的精神。同書第八章說：「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，又不爭。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」第六十四章亦謂：「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。」這是告訴我們，天道效法自然，而自然就是道性，道性也就是人的本性。因此，從兵法上來看，一旦採用「破勝」的策略，就會導致干戈傷害，故不戰而屈人之兵，才是孫子心目中上乘的戰略思想，其「非戰」而全勝的觀念，就是一種道勝救劫¹⁷的觀念。至於孫子所謂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，就是《老子》六十八

¹⁷劫，泛指災難，各大宗教皆有所指，例：天帝教的三期末劫；道教的末世；佛教的成、住、壞、空四個中劫。

「劫」是梵文劫簸（kalpa）的音譯，它在印度，並不是佛教創造的名詞，乃是古印度用來計算時間單位

章所說的「古之善爲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善用仁者爲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以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古之極。」不武、不怒、不爭之善，順乎天道自然。

原文二：

故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攻城之法，為不得已。修櫓轆輻，具器械，三月而後成；距堙，又三月而後已。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，殺士卒三分之一，而城不拔者，此攻之災也。

解析：

孫子的戰略思想有分爲四個層次：伐謀、伐交、伐兵、攻城。前面的〈隆中對〉說：「若跨有荆、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好孫權，內修政治。」諸葛亮建議劉備先佔有荊州、益州，以漢室後裔之名昭告天下，可以說是伐謀；至於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孫權，則可以說是伐交。這些都是爲了日後襲取南陽、洛陽，以及北出秦川預作準備。惟此種左右夾擊的伐兵之道，必須掌握住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

依孫子觀點，攻城是萬不得已的方法，理由是耗費人力、物力。一旦發動攻擊，必須以三個月的時間準備攻城用的兵車、器械，並且用三個月的時間修築攻城用的土壘。如果，將帥下令發動攻擊，士兵又要損傷三分之一，若城池依然攻不下來，那就真的徒勞無功了。

伐謀、伐交與伐兵、攻城相輔相成，兩者關係就好比救劫、行劫一般。孫子的目標在於全勝，是大一統的道勝思想，伐謀、伐交與伐兵、攻城交互爲用。如以救劫、行劫爲喻，可以說救劫當中有行劫，行劫當中有救劫，最終目的還是回歸於道。道就是中國戰略思想的最高指導原則。

原文三：

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戰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毀人之國而非久也，必以全爭於天下，故兵不頓而利可全，此謀攻之法也。

的通稱，可以算作長時間，也可以算作短時間，長可長到無盡長，短也可以短到一剎那。語出自維基文庫佛學大辭典(<http://zh.wikisource.org/>)。

這一段等於為〈孫子·謀攻〉做一個小結，說明真正用兵的最高境界，在於不費一兵一卒就令敵人屈服，如此自可輕易掠取敵人城堡，進而摧毀敵人國家。此種「求全」的戰略原則，能消彌戰爭於無形，保存我軍的實力，並獲得最完整的利益。要之，謀攻的目的在於「求全」，必以全爭於天下，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。

據《史記》記載，孫子本為齊人，這就不難聯想到孔子稱讚管仲「如其仁」。何以見得？因為，管仲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並非依賴武力，而是運用了謀攻之法。〈管子·七法〉曰：「成功立事，必順於理義。故不理不勝天下，不義不勝人。故賢知之君，必立於勝地，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。」順於理義，就是以全爭於天下；必立於勝地，也就是先立於不敗之地。有了以上的前提，才能九合諸侯，不戰而屈人之兵。這個看法恰巧可與《孫子》相對照。

原文四：

故用兵之法，十則圍之，五則攻之，倍則分之，敵則能戰之，少則能逃之，不若則能避之。故小敵之堅，大敵之擒也。

〈孫子·軍形〉曰：「兵法：一曰度，二曰量，三曰數，四曰稱，五曰勝。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數，數生稱，稱生勝。」本段主要是透過計量衡量敵我情勢。例如，當我軍有十倍於敵方的軍力優勢時，可以採取圍攻的方式；當五軍兵力五倍於敵人時，可以憑藉強大的兵力正面攻擊；若我軍只有敵方兩倍的兵力時，採取包圍戰可能會分散自己的兵力，故只能以分兵夾擊兩側，劉備的益州之軍出於秦川與荊州之軍向南陽、洛陽，即是基於此種思考。若兩軍兵力相當，則應奮力一戰；若我軍兵力過少，則應避戰以求自保，如劉備避開曹操的百萬大軍一樣。在敵我實力懸殊的情況下，弱者之冒進猶如以卵擊石。

就野戰要領來看，〈管子·七法〉云：「輕重也、大小也、實虛也、遠近也、多少也，謂之計數。」〈孫子·始計〉也說：「故經之以五事，校之以計，而索其情。」主帥必先計量敵方軍力，先求知於敵情，才能掌握機先，致人而不致於人。故〈管子·七法〉才說：「舉事必成，不知計數不可。」我方依敵人兵力適度調整戰略，就是「識眾寡之用者勝」。

此外，後文提及：「故知勝有五：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，識眾寡之用者勝，上

下同欲者勝，以虞待不虞者勝，將能而君不禦者勝。此五者，知勝之道也。故曰：知己知彼，百戰不貽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戰必敗。」前段所說的五個知勝之道，不外是在「求知」，例如能否一戰、眾寡之用、上下同欲、虞與不虞等等。然而，國君與將領間的關係亦須考慮。因為，「夫將者，國之輔也。輔周則國必強，輔隙則國必弱。」（〈孫子·謀攻〉）是以「智者之慮，必雜於利害，雜於利而務可信也，雜於害而患可解也。」（〈孫子·九變〉）

「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：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，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，是謂糜軍；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，則軍士惑矣；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，則軍士疑矣。三軍既惑且疑，則諸侯之難至矣。是謂亂軍引勝。」（〈孫子·謀攻〉）不知進退則為糜軍，不知事(事務)、權(權變)而同政(管理)、同任(責任)，則為亂軍引勝。這是君主駕御將領、控制軍隊不得不掌握的地方。

伍、孫子的道勝

〈尉繚子·戰威〉有云：「凡兵，有以道勝¹⁸，有以威勝¹⁹，有以力勝²⁰。」講武料敵用的是謀攻之法，使敵之士氣喪失而師散，雖形全而不為用，如同《新境界》原序云：人類生活是人類思想的反映。從思想上下手，謀攻篇第一段便是強調全勝，以保全整體，也就是求全，屬於總體戰略，孫子所講的道為：「道者，令民於上同意，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不危也。」〈孫子·始計〉，在隆中對中：「身帥益州之眾出於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」百姓能以箪食壺漿來迎接劉備，正因為是信義著於四海，〈管子·七法〉所說的成功立事，必順於理義。而六韜的文韜中，文王問姜太公：

「文王曰：樹斂若何，而天下歸之？太公曰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，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。天有時，地有財，能與人共之者仁也。仁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與人同憂同樂，同好同惡，義也。義之所在，天下赴之。凡人惡死而樂生，好德而歸利，能生利者道也，道之所在，天下歸之。」

此正為天下為公，胸懷天下，心存仁義，因為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，以天下之利益為依歸，所以〈孫子·謀攻〉才說：「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而非戰也，拔人之城而非攻也，毀人之國而非久也，必以全爭於天下，故兵不頓而利可全，此謀攻之法也。」以全爭於天下，正是胸懷天下的總體戰略。

¹⁸ 〈尉繚子·戰威〉：講武料敵，使敵之氣失而師散，雖形全而不為之用，此道勝也。

¹⁹ 〈尉繚子·戰威〉：審法制，明賞罰，便器用，使民有必戰之心，此威勝也。

²⁰ 〈尉繚子·戰威〉：破軍殺將，乘闖發機，潰眾奪地，成功乃返，此力勝也。

〈孫子·謀攻〉又說：「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也；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」所以孫子實際上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用兵的最高境界，也就是求善之善者，如同老子的上善若水，大海能夠容納百川，更能包容萬物，而孫子將其應用到兵法上，在〈孫子·虛實〉中：「夫兵形象水，水之行避高而趨下，兵之形避實而擊虛；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敵而制勝。故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。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，謂之神。」所謂，兵者，詭道也。指的是用兵的奇詭變化，如〈孫子·軍爭〉：疾如風，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動如山，難知如陰，動如雷震。亦如同易經八卦的變化，〈易·說卦傳〉第四章：「雷以動之，風以散之，雨以潤之，日以煇之，艮以止之，兌以說之，乾以君之，坤以藏之。」〈易·繫辭傳〉第八章又說：「易之為書也，不可遠，為道也屢遷，變動不居，周流六虛，上下无常，剛柔相易，不可為典要，唯變所適。」講的是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的變道。

孫子又強調修道保法，所以〈孫子·始計〉講主孰有道？〈孫子·軍形〉說：「善用兵者，修道而保法，故能為勝敗之政。」主要是令民與上同意，上下同欲者勝，修明政治，厲行法治，孔子也說：政者，正也。由上而下，由形而上的思想影響行而下的生活，正確、正當的決策，具有生命共同體²¹的共識，共同的意念會形成強大的無形力量²²，正所謂：道之所在·天下歸之。道勝思想實為理一分殊²³。

陸、結論

《新境界》第七章提到：

萬流歸宗，宇宙天理之真象在一「和」字。大方向來講，旋和系之運行不得其「和」，即成混沌；物質與自然不得其「和」，即無生機；小的方向來講，人生之電子與和子不得其「和」，即有死亡；人類心理感應不得其「和」，即生仇；社會秩序不得其「和」，即有變亂；國際不得其「和」，即生戰爭。和之相對即為「亂」。

「和」「亂」對照表如下：

| | | | | |
|---|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和 | 奮鬥 | 世界大同 | 自由神靈 | 聖凡平等 |
| 亂 | 侵略 | 戰亂循環 | 偶然和子 | 輪迴顛倒 |

道者，和也。

²¹ 〈孫子·始計〉：道者，令民於上同意，可與之死，可與之生，而不畏危也。

²² 〈孫子·虛實〉：微乎微乎，至於無形；神乎神乎，至於無聲，故能為敵之司命。

²³ 朱熹把理一分殊作為其理一元論哲學的重要命題，從本體論角度指出，總合天地萬物的理，只是一個理，分開來，每個事物都各自有一個理。然千差萬殊的事物都是那個理一的體現。

可以肯定的是，孫子所謂的求全、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即是救劫的道勝思想，可以撥亂返和。在該書中，〈孫子·謀攻〉的「全」字出現最多。至於謀，就是戰略、計劃的意思，戰略之定義與區分，依徐瑜的說法可分為：

- 一、大戰略：建立並運用同盟力量，爭取同盟目標者。
- 二、國家戰略：建立並運用國力，爭取國家目標者。
- 三、軍事戰略：建立並運用三軍之力量，以爭取軍事目標者。
- 四、野戰戰略：運用野戰兵力，以爭取戰役目標，或從事決戰，而支持軍事戰略者。

從大戰略到野戰戰略，〈孫子·謀攻〉中的伐謀、伐交，目的是讓敵人的野心消彌於無形，可以說是援心入兵。而〈隆中對〉所主張的西和諸戎、南撫夷越、外結孫權，就是一種大戰略，即孫子所說的衢地則合交，運用同盟力量互相掩護，爭取同盟國以為屏障。然而，國與國間往往因利害而結合，復因利害而分離。所以，對於大戰略的制定，必須深謀遠慮，切忌短視近利。

《新境界》緒論有言：「無形同化，組成各洲聯邦，公推國聯盟主，確保集體安全，人類種族間一切戰爭於是永遠消滅。和平燦爛，『世界大同』，進而科、哲昌明終極，陰陽永達和準，熙來攘往，極樂逍遙，自然『天人大同』。」組成各洲聯邦，公推國聯盟主，就是運用同盟力量，至於世界大同與天人大同，即為同盟目標，但前提是要以三奮(向自己奮鬥、向自然奮鬥、向天奮鬥)及聖凡平等的思想啓發人類大公無私共生共存之高尙心理。這是有形無形、聖凡、天人之間的大戰略。至於「用兵之法，十則圍之，五則攻之，倍則分之，敵則能戰之，少則能逃之，不若則能避之。故小敵之堅，大敵之擒也」者(〈孫子·謀攻〉)，只是應用層面的野戰戰略。

道勝思想最終之目標為「撥亂返和」，而區孫子其實是一個非戰²⁴主義者，道勝闡述了軍事作戰的根本原則，明確了戰爭與政治及經濟民生的關係，從「詭道」到「兵道」再到「君道」，以戰爭的視角，闡述了道法自然的最高法則，雖然孫子沒有用較多的文字就道勝展開具體論述，但其作為戰爭求勝的最高原則始終貫徹在《孫子兵法》的字裏行間。作為《孫子兵法》和傳統兵學的基本內涵，道勝主張用不流血的方式，達到全勝的戰爭目的，屬於非戰的軍事智慧。

道勝其實是一種救劫精神的生命力，胸懷天下²⁵的宇宙生命觀，心存仁義，道心聯

²⁴ 〈孫子·謀攻〉：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也；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《老子》六十八章：「古之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。」

²⁵ 天帝教首任首席使者涵靜老人，本師世尊所說：不為自己打算，不求個人福報。也就是擴大心胸。

圖二：



捌、參考文獻

一、專書

- 1.李極初：《新境界》，南投縣：帝教出版社，1999 三版。
- 2.余培林：《新譯老子讀本》，台北市：三民書局，2006 年 1 月初版十九刷。
- 3.吳怡：《新譯老子解義》，台北市：三民書局，2005 年 10 月初版七刷。
- 4.鈕先鍾：《孫子三論》，台北市：麥田出版，2006年。
- 5.徐瑜：《孫子兵法》，台北市：時報文化，1994年。
- 6.湯孝純注譯，《管子讀本》，台北市：三民書局，1999。
- 7.袁鐘仁譯注，《諸葛亮文》，台北市：錦繡文化，1992。
- 8.劉琳譯注，《三國志》，台北市：錦繡文化，1992。
- 9.駢宇騫校注，《五經七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。
- 10.曹勝高,安那譯注，《六韜·鬼古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。
- 11.黃壽祺,張善文，《周易譯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。
- 12.錢穆，《國史大綱》上冊，臺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5。
- 13.汪知亭，《中國通史綱要》，臺北市：一文出版社，1974。
- 14.鈕先鐘，《孫子三論》，，臺北市：麥田出版，2006。

二、期刊論文

- 1.韓大勇：《孫子》戰略戰術思想研究，南華大學，1990。